

中国中东外交三十年(下)*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上海 200083)

摘要: 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东外交的深入发展: (1)能源合作不断增强,中东已成为中国石油进口最重要的地区; (2)同阿盟、海合会等中东地区与次地区组织之间的合作不断加强; (3)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程度加深,机制渐趋健全; (4)在伊拉克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5)在伊朗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从中美在中东战略竞争加剧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中东外交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 中国; 中东; 外交

中图分类号: D8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92(2009)01-0077-06

笔者曾在《中国中东外交三十年》(上)(《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一文中,从中国中东外交的总体转型、双边关系、政治互信与合作、经贸合作、文明对话五个方面,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东外交的深入发展。本文将继续从能源合作、同中东区域组织的关系、中东和平进程、伊拉克问题、伊朗问题五个方面继续探讨中国中东外交的发展。

一、能源合作领域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

众所周知,石油供求矛盾的发展使中国在1993年成为油品净进口国,1996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中国进口石油的一半左右依赖中东,其中从沙特和伊朗进口的石油占中国进口石油的30%左右^[1]。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进口中东石油的数量上升趋势明显。从1990年的115.36万吨增至2002年的3539.12万吨,12年间扩大了近30倍。我国从中东进口石油占总进口石油的比例自2000年以来已超过50%。^[2]随着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的不断增长(参见下表),双边能源合作日益“具有深厚的物质基础、双赢互利的发展前景及长期性和战略性的内涵”^[3]³¹。在此背景下,能源外交已经在中国的中东外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能源安全已经成为中国中东外交的首要考虑”^[4],中国对沙特、伊朗、伊拉克以及海合会的能源外交尤其引人注目^[5]。当然,受中东地区复杂局势的制约以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石油利益的竞争关系,中国与中东的能源合作依然面临诸多的问题与挑战。

二、同中东地区与次地区组织的合作不断加强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同阿拉伯联盟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1982年阿盟代表团访问中国;1993年阿盟秘书长马吉德访华;1997年钱其琛在访问中东期间会见阿盟秘书长马吉德,提出发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四点建议;1998年阿盟理事会作出加强对华关系决议;1999年唐家璇在开罗阿盟总部会见阿盟秘书长马吉德,双方签署了《关于建立政治磋商机制的谅解备忘录》。2000年11月阿盟秘书长马吉德致函中国,赞赏中国在阿以冲突问题上为寻求和平、公正的解决方法所作的努力。^[6]

收稿日期: 2008-04-21

作者简介: 刘中民(1968-),男,河北迁西县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东政治与文化、国际政治理论、国际海洋问题。

* 本文为2006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年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07SG39)的阶段性成果;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市重点学科阿拉伯学(B702)建设项目成果。

年度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	8.42	31.60	35.87	88.34	121.68	276.67	258.36
中国石油总进口	21.33	82.91	90.13	165.10	199.45	512.94	506.67
从中东进口占总进口的比例	39.47%	38.12%	39.79%	53.50%	61.00%	53.93%	50.99%

资料来源: Jin Liangxiang, Energy First,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Quarterly, Spring 2005, <http://www.meforum.org/article/694>.

9·11事件发生后,中国与阿盟多次就中东热点问题交换意见。2004年胡锦涛在访问埃及期间会见阿盟秘书长穆萨,提出了建立中阿新型伙伴关系的四点建议:(1)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增进政治关系;(2)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密切经贸往来;(3)以相互借鉴为内容,扩大文化交流;(4)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此次会谈中,双方宣布正式成立“中阿合作论坛”。2004年9月,中阿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阿盟总部召开,签署了《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和《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2005年中阿合作论坛高官会议在北京召开,研究落实《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的具体步骤。“中阿合作论坛企业家大会”也于同年在北京召开。^[6]2005年第18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专门通过决议,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2006年“中阿合作论坛”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胡锦涛在会见阿拉伯国家代表时,总结了中阿关系的成功经验:(1)双方相互尊重,彼此信赖,真诚相待;(2)双方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共同发展;(3)双方相互支持,密切配合,维护共同权益。唐家璇在讲话中提出中阿应成为友好互信的伙伴,共同发展的伙伴,促进不同文化和谐共处的伙伴,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的伙伴。会议签署了《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会议公报》《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2006至2008年行动执行计划》以及建立企业家大会机制和环境合作机制等文件。对此,俄罗斯《政治杂志》作出高度评价:中阿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中阿合作的巩固不仅能够解决各种地区和局部问题,也起到显著改变全球力量对比的作用。^[7]

海湾合作委员会(GCC,以下简称海合会)于1981年5月25日宣布成立,两天后中国就与海合会建立了外交联系;1992年中国贸促会和海合会联合在北京举办“中国与海湾国家工业经济合作研讨会”;1996年中国与海合会决定建立定期磋商机制,以增进双方的经济与贸易合作,每年轮流在北京和海合会秘书处总部所在地利雅得举行磋商会议^[8]。1998年3月召开的第66届海合会外长理事会首次将发展对华关系写入会议决议。此外,自1990年起,我国外长每年赴纽约出席联大期间均与海合会六国外交大臣或其代表进行会晤,就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及中国同海合会的关系交换看法^[9]。

2004年7月,海合会秘书长和六国财长联合访华,双方签订了“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并宣布启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2005年4月和6月,中国与海合会分别在利雅得和北京进行了两轮自由贸易区谈判,2006年1月双方在北京进行了第三轮自由贸易区谈判。^[8]为加强双方关系,胡锦涛提出,双方应充分发挥政治磋商机制的作用,加强交流,增进互信,共同维护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经济互补性强的优势,扩大经贸合作,加快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发展双方在投资和金融领域的合作;完善能源对话机制,共同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深化双方在能源领域的互利合作^[10]。

三、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程度加深,机制渐趋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调整了对巴勒斯坦和阿以冲突问题的政策。1988年,钱其琛宣布了中国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五点主张:中东问题应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阿拉伯被占领土应予以归还;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应予以恢复,以色列的安全也应得到保证;支持召开有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参加的中东国际和平会议;支持中东各方进行各种形式的对话,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互相承认^{[11]368}。中国首次强调了以色列安全以及双方互相承认的重要性。

1991年马德里和会召开,中国积极支持中东和平进程并为此不断作出努力。1997年钱其琛阐述了中国关于中东问题的五点主张:以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遵循“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推进中东和

谈;认真履行已达成的各项协议;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加强地区经济交流与合作,阿以间逐步建立相互信任,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国际社会有责任为实现中东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作出努力,中国愿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12]。

自2000年巴以冲突再度加剧,中东和平进程受阻后,中国希望有关各方切实执行联合国有关中东问题的决议,坚持遵循“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实现中东地区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中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恢复包括建立独立国家在内的合法民族权利,呼吁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军事进攻、定点清除和修建隔离墙的举动。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多次阐述中方对中东和平进程的立场,积极做有关各方的工作。中国为中东和平进程所作的外交努力,得到了包括巴以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认可。2002年,以色列外长佩雷斯表示,以色列欣赏中国所作的外交努力,中国在未来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将发挥广大的作用。^[14]为加强中国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参与能力,自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派王世杰和孙必干任中东问题特使,多次前往中东地区,宣传中方主张,积极劝和、调解。中国向中东派遣特使,既是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特别是中东地区形势的变化,也是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自身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对地区事务影响力提升的客观情况使然。^[13]

2003年底,唐家璇提出了中国对中东问题的四点主张:(1)建立互信,恢复和谈;(2)重启“路线图”计划,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3)积极谋求实现中东全面持久的和平;(4)国际社会应加大促和力度。^[14]2004年,中东和平进程严重受挫,在以色列全力推进“单边行动”、加紧修建“隔离墙”、阿拉法特病逝的关键时刻,唐家璇出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提出了中国关于中东问题的四点主张:逐步建立互信,尽快恢复和谈;加快落实“路线图”计划,尽早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召开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有关各方参加的中东和平会议;致力于实现中东地区全面持久的和平。^[17]

在2007年下半年召开的中东问题安纳波利斯会议上,杨洁篪外长提出了五点主张:尊重历史,彼此兼顾,把握和谈方向;摒弃暴力,排除干扰,坚定和谈信心;全面推进,平衡发展,营造和谈气氛;重视发展,加强合作,夯实和谈基础;凝集共识,加大投入,加强和谈保障^[15]。中国强调在中东和平“路线图”和“阿拉伯和平倡议”基础上,启动最终地位谈判,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是和谈的方向;摒弃暴力,坚持对话,甚至必要的妥协是和谈的重要手段;平衡推进中东问题各线的谈判,稳妥处理中东地区其他热点问题是和谈的重要基础;加大对巴勒斯坦人道主义援助,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是和谈的重要条件;建立广泛参与、平衡有效的多边促和机制、监督机制和执行地制是和谈的重要保障。这些主张反映了中国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新思考,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2007年,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四度出访地区国家,出席了援助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国际会议,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

四、在伊拉克问题上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

在1990~1991年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中,中国明确反对伊拉克吞并科威特,但始终强调和平手段解决危机,不赞成对伊拉克动武。根据这一原则立场,中国对安理会通过政治、外交、经济等手段迫使伊拉克撤军的决议都投了赞成票,但对授权美国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678号决议投了弃权票。海湾战争后,中国主张伊拉克应全面、切实地执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同时认为伊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安全关切应予以尊重。在武器核查危机中,中国不赞成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呼吁有关各方采取克制和灵活态度,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在1998年初举行的安理会上,中国与俄、法一起主张结束对伊拉克的制裁。^[16]

进入21世纪后,在从对伊武器核查到伊拉克战争前后,中国始终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反对“先发制人”打击的单边主义行为;同时又在本国力量和利益所及的范围内进行斡旋与斗争,采取战略明确、战术超脱的灵活策略,在坚持国际道义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既发挥了负责任大国应有的作用,又成功地实现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外交方针的辩证统一。^[17]在主战与反战阵营之间,中国根据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对某些立场给予认同,对另外一些主张则保持适当距离。国际舆论评价说:“从战略角度看,中国是反战的,但从战术角度看,它正试图使自己尽可能远离主战派和反战派这两个阵营。因此,当联合国安理会出现分歧时,对中国而言发挥影响的最佳方式就是在双方之间进行仲裁,以阻止安理会全面崩溃。”^[17]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中国坚定支持伊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主张通过政治进程,以和平、民主

的方式解决各派的分歧,实现伊的安全与稳定。中国主张伊拉克的统一、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应得到维护,应尽快实现“伊人治伊”,伊新政权应具有广泛代表性,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各方在伊的合法权益应得到充分尊重和维护;联合国应在伊重建中发挥全面作用。在安理会通过有关涉伊问题的决议中,中国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受到各方重视与好评。^[14]为此,中国通过多边和双边两个渠道积极开展工作。中国积极参与推动伊拉克政治经济重建的国际会议。2007年5月,杨洁篪外长出席了在埃及召开的“伊拉克国际契约”和伊拉克周边外长扩大会议,阐述了中国对伊拉克问题的原则立场,指出团结、稳定和发展是伊拉克问题面临的三项主要任务,其中团结是关键,伊不同民族与教派应加强对话,促进和解,保障所有人平等参与政治生活,公平分享财富,把政治解决放在突出位置,通过综合治理实现稳定;同时强调伊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以及联合国支持伊政治经济重建的重要性;宣布中国政府向伊提供5000万元人民币无偿援助,并愿大幅度减免伊拉克欠中方债务^[18]。

五、在伊朗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对于1979年伊朗革命,中国“认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应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中国不干涉伊朗内政,不赞成也不参与对伊朗进行的制裁”^[16]。两伊战争中,中国均“采取表明自己的立场,但不直接介入的政策,同时也反对外部势力的插手和干预,希望各国通过和平途径自己解决”^{[19][419]}。

自2003年伊朗核问题凸现以来,中国一直面临沉重压力。新加坡《联合早报》评价说:“一方面,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交织日益广泛,它必须维持与它们的建设性合作关系;而另一方面,伊朗是中国进口能源的来源地之一,也是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成员。中国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强硬措施,不仅会打乱自己的能源战略部署,而且还有可能损害它与中东国家的良好关系。”^[20]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始终坚持三条基本原则:第一,伊朗不应坚持开发核武器;第二,国际社会不应谋求以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第三,应通过谈判、沟通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因此,坚持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积极推动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全面合作,通过对话政治解决伊核问题,维护中伊关系的正常发展,是中国的基本立场。^[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始终反对把伊朗核问题交给安理会处理,主张由欧盟在美伊之间进行外交斡旋。

自欧盟三国的外交协调陷入僵局和2006年1月伊朗恢复铀浓缩活动以来,伊朗核问题经历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内协调,在六国机制内磋商,在联合国安理会内讨论三个不同而又彼此关联、交叉的阶段。中国从一开始就努力争取伊朗核问题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内得以解决,并通过双边途径做伊朗工作,敦促伊朗采取措施,加强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谋求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但是,2006年2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一份由美国主导的决议案,决定把伊朗核争执“报告”给联合国安理会。^[21]针对这种转变,中国仍继续主张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在六国机制的框架内,中国积极与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德国进行沟通和磋商。2007年6月,在中国的推动下,六国达成了“复谈路线图”和“谈判原则和框架联合宣言”,即“六国方案”。伊朗虽然表示愿同对方继续探讨复谈文件,并愿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解决未决问题,但坚持不放弃铀浓缩活动,伊核问题随之激剧升温,美国竭力推动安理会强化对伊制裁,并扬言不排除对伊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在此情况下,安理会先后通过了关于伊核问题1737号和1747号决议。中国基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以及安理会决议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的严肃性,对上述两个决议投了赞成票,但仍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有关各方的双边和多边的外交谈判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佳选择。

结束语:中国中东外交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近年来,中东地区作为我国周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主要的能源供应地,对我国国际战略和能源安全的重要意义日渐凸现,我国与中东国家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加^[22]。就中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而言,在政治层面,中东是中国重要的战略依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离不开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和配合;在经济层面,中东是中国最大的海外能源供应地、重要商品劳务出口和工程承包市场;在安全层面,中东“三股极端势力”通过中亚、南亚向中国西部地区的渗透,构成中国西部边疆稳定的潜在威胁;在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层面,中东问题是联合国框架内大国博弈的重要领域,使得中东成为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国际形象的重要舞台。但是,随着对中东问题参与程度的提高,中国中东外交所面临的诸多潜

在问题与矛盾也日益凸现,并构成中国中东外交的重要掣肘。受篇幅所限,本文最后仅就中国与美国在中东战略竞争日趋加剧这一重点问题略谈一二。

中国与美国的中东战略在存在战略共识的同时,也存在着战略分歧,尤其是美方对中国中东战略的误解使双方在中东存在战略竞争乃至战略紧张的可能。在战略共识方面,中美在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消除地区动荡和混乱根源、确保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合理与稳定等方面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在具体行动上,中美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如中国协助美国调查恐怖分子在中国银行的资金;承诺向阿富汗和伊拉克分别提供 1 5亿美元和 2 500万美元援助;准备灵活处理萨达姆时期拖欠中国的 70亿美元债务;为达尔富尔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美国、联合国共同支持非盟在苏丹的维和行动等。^[23]但是,近年来中国对中东事务参与能力的增强,已经引起美国的高度重视,并将其视为对美国的挑战。

第一,在战略层面,美国认为中国在中东的战略地位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通过中东对美国进行战略牵制。有人撰文指出,20世纪 80年代,中国在波斯湾的利益尚十分有限,也没有力量向美国发起挑战。2000年以来,经贸利益、武器销售、能源需求和地缘利益使得中国在中东的存在具有多重战略动机,中国已经开始在中东扮演重要的角色,包括发挥抑制美国和其他大国力量的潜在作用。^[18]另有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日趋老练的外交试图将中东作为对美外交的地缘政治平衡物 (geopolitical counter weight)。在本质上,北京将中东持久的危机视为使美国难以脱身的有力因素,而不是视其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21]还有略显温和的报告指出:“尽管中国和美国不会在中东展开公开的竞争,但是中东成为未来中美竞逐的舞台却是不难想象的。”^[11]

第二,把中国与中东日益密切的能源合作视为威胁西方能源安全,制约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因素。在美国看来,“在围绕中东石油的竞争日趋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具有扩张性的能源政策已经对美国的能源安全构成了威胁”^[21]。中国与沙特、伊朗等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在美国有被日益政治化的趋势。美国认为中国在伊朗油气部门的投资超过了美国《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的限制,并扬言对中国进行制裁,同时认为中国与伊朗的油气资源合作破坏了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安排。有人撰文指出,2004年,在美国试图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之际,中国却在当年与伊朗签署了 1 000亿美元的油气合同;在 2006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安理会的决定后,中国一再坚持拖延进行对伊朗制裁的讨论。^[24]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介入中东,“至少在理论上讲,为伊朗避开与西方的接触和自信地挑战西方的利益提供了战略支持”^[25]。对于中国与沙特的能源合作,在 9·11事件后美沙关系受到冲击的情况,更是被美国加以政治化,认为中国与沙特的能源合作使沙特“正在追求一种通过与中国发展更加有活力的战略关系而防范美国的战略”^[26]。

第三,中国对中东的武器销售被美国视为影响中东地区稳定、妨碍美国中东战略的因素。有文章认为,“中国作为中东地缘政治的新角色”,“已经深入到世界上油气资源最为丰富、冲突最为集中的地区,中东已经为中国发挥其领导能力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从巨大的武器销售中获利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中国却置地区稳定于不顾”。^[21]另有文章指出,“武器销售已经成为中国中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武器销售在经济和政治目标方面具有广泛的一致性。武器销售和技术转让帮助中国加强了与中东地区的经济与政治联系,并使其具有了在全球层次的问题上获得发言权的杠杆 (bargaining leverage on global level issues)……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解释美国不得不向中国施加压力以获得中国在武器销售和技术转让方面半心半意的承诺 (halfhearted compliance)”。^[18]美国还指责中国向伊朗、利比亚、叙利亚出售的武器,多大部分又被上述国家提供给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等恐怖组织^[21]。

第四,将中国在联合国关于中东问题决议表决中的立场和做法,视为故意为美国的中东战略设置障碍。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巴以、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等问题时,中国代表均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表明自己的态度,并与有关国家协调立场。由于中国坚持联合国在解决中东问题上的主导作用,坚持通过谈判、对话和发展作为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因此,在部分美国人看来,中国的中东政策是故意为美国的中东政策设置障碍。

总之,中国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竞争已经日益凸现。由于在中东的战略目标不同,中美在能源政

策、反恐政策、防扩散政策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随着中国对中东影响的增强,在未来中美关系的战略互动中,双方保持一定的战略竞争是正常的,但中美双方应增进对彼此利益关切的相互理解,妥善处理双方的分歧,使其不至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同时也不至对中国的中东外交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

注释:

- ¹ 本文中的伊朗问题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伊朗核问题等与伊朗相关的问题。
- ^o 该方案同意伊朗拥有民用核计划,支持伊朗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向伊朗出售民用飞机零部件;美准备与欧盟一起同伊朗谈判;要求伊朗停止铀浓缩和加工活动等。这是一个包含诸多积极因素、较为平衡的一揽子方案。

参考文献:

- [1] Chietgj B ajpaee, "China Becomes Increasingly Involved in the Middle East", 10 March 2006, http://www.pinar.com/report.php?ac=view_report&report_id=455&language_id=1.
- [2] 杨光. 从能源联系看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互利合作 [EB/OL]. http://waa.cass.cn/Suokan/show_Suokan_ls.asp?id=233.
- [3] 吴磊. 关于中国—中东能源关系发展的若干思考 [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7(3).
- [4] Jin Liangxiang, "Energy First: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Quarterly, Spring 2005, <http://www.meforum.org/article/694>.
- [5] 刘琴. 中国对中东的石油外交 [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5(1).
- [6] 中国与东盟关系概况 [EB/OL]. <http://eg.china-embassy.org/chn/zagx/yan/gx/0155465811/default.htm>.
- [7] 新时期中阿关系的发展和中國中东政策的演变 [EB/OL]. <http://www.arabsino.com/arabsino/stheles/1178341157d74196.html>.
- [8] Steve A. Yetiv and Chunlong Liu, "China: Global Energy and the Middle East" [J]. Middle East Journal, Spring 2007.
- [9] 我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 [EB/OL]. <http://www.arabsino.com/arabsino/gulf/kuwait/1191490901d76733.html>.
- [10] 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与中国在经济上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EB/OL]. <http://www.arabsino.com/arabsino/gulf/kuwait/1191490693d76732.html>.
- [11] 彭树智. 二十世纪中东史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 [12] 钱其琛同东盟秘书长会谈 [N]. 人民日报, 1997-12-26.
- [13] 中国派遣特使表明中国对中东外交政策有变化 [EB/OL]. <http://www.southcn.com/NEWS/china/zgxx/200209260875.htm>.
- [14] 赵国忠.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友好合作关系源远流长 [EB/OL]. <http://www.investnet.cn/News/ShowInfoxy.aspx?ID=3411>.
- [15] 杨洁篪在中东和会上阐述中方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 [EB/OL]. <http://www.fmprc.gov.cn/chn/zxxx/384916.htm>.
- [16] 安维华. 中国—中东友好合作关系稳定发展 [EB/OL]. http://waa.cass.cn/Suokan/show_Suokan_k.asp?id=756.
- [17] 余建华. 伊拉克战争与中国外交 [EB/OL]. http://waa.cass.cn/Suokan/show_Suokan_ls.asp?id=199.
- [18] 杨洁篪表示中国支持“伊拉克国际契约” [EB/OL]. http://finance.ce.cn/szsd/200705/03/t20070503_11250105.shtml.
- [19] 肖宪. 世纪之交看中东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8.
- [20] 华黎明. 伊朗核问题与中国外交的选择 [J]. 国际问题研究, 2007(1).
- [21] JiHyeh Shin and John J Tkacik,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A New Patron of Regional Instability", September 26, 2006,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bg1974.cfm>.
- [22] 李伟建. 中东在中国战略中的重要性及双边关系 [EB/OL]. http://waa.cass.cn/Suokan/show_Suokan_ls.asp?id=242.
- [23] 王猛. 中国参与中东经济事务的全球视角分析 [EB/OL]. <http://www.arabsino.com/arabsino/ableague/1189232941d76650.html>.
- [24] A lissa Rubin and John Daniszewski, "U. N Panel Puts Iran on Notice" [N].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5, 2006.
- [25] Flynt Leverett, Jeffrey Bader, "Managing China—U. S. Energy Competition in the Middle East" [J].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5—2006.
- [26] Frank A. Verrastq, James A. Plack, Alan S. Heiburg, "Securing in a Changing World" [J]. Middle East Policy, Winter 2004.

(责任编辑 敬 军)